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

江 春

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学的主题,也是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中所面临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用于生产其它商品或劳务的资本资源)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总是有限的或稀缺的,这就使得人们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好人和社会应该如何作出抉择,以便把稀缺的资源合理配置到各种相互竞争的用途上,从而以最少的资源消耗生产出最多的为社会所需要的商品或劳务这样一个问题,使国民财富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使人民得到最大限度的福利,这也就是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基本内容。对于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但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好这一问题的意义极为巨大。

一、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因素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以下一系列经济和制度条件,如:对私有财产有保障的制度,社会的资源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用于生产各种商品或劳务,发达的市场体系和能够真实反映供求状况及稀缺性的合理的价格体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种资源能够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而自由流动到更有利的用途上,从而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使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化。绝大多数国家几乎都不具备这些经济和制度条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使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的不利因素:

(一)由于供给弹性不足和供给结构刚性,以及某些制度上的原因,消费者并不能行使其决定社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主权,这就使得经济资源不能配置到社会真正需要的用途上。

(二)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使社会购买力不足,结果造成市场规模狭小,再加上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信息通讯系统的落后,又使市场处于分

割隔绝的状态,这就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现代化工厂的建立,使得资源不能按照“规模经济”的原则得到有效利用;

(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当局常常热衷于以各种形式干预价格机制,结果使得价格体系不合理,价格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和相对稀缺,且价格具有刚性,不能灵活升降,特别是要素(生产中使用的资源)价格扭曲,不能反映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结果形成越稀缺的资源,其价格越低,越丰裕的资源,其价格越高这一反常现象。这一扭曲的价格体系就给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提供了错误的信号,使稀缺的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而丰裕的资源又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结果造成浪费;

(四)基础设施缺乏。水利电力设施,通讯设施、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等等基础设施是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并能够满足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所达不到的某些社会性需要。但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些基础设施,结果使得各种产业难以建立和发展,国内资源不能迅速顺利地投入到各种生产途径上去;

(五)资源的利用能力差。西方某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并不在于其资源的缺乏,而在于其资源利用能力的落后。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能抓住市场机会,并及时将各种生产要素(资源)正确地组合起来,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组织形式,从而生产出新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并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由于缺乏这样一个企业家阶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就必须亲自负责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这就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但这却又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此外,也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等等。这一切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源的能力很差;

除以上外,还有其它一些不利因素也阻碍着发展中国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诸如传统的价值观念,落后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等,总

之,由于这一切原因,导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二、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策略

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西方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一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配置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源配置的部门选择——“平衡增长”论与“非平衡增长”论

以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和罗森斯坦——罗丹等人为代表的“平衡”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从而大力“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各种资源(尤其是资本)全面地同时配置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或行业,使各部门或行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不发达经济中所存在的生产函数、需求和储蓄供给这三个方面的“不可分割性”给经济发展设置的障碍。

所谓生产函数的不可分割性,是指直接生产部门与基础设施、工业与农业、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等两者之间必须平衡发展,否则,生产就难以正常进行。

所谓需求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各部门的产品存在着互为需求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资源同时配置到各个部门,使各个部门同时发展,通过借助各部门间普遍存在的投入产出联系,使各部门的产品互为需求,从而形成广大的市场,这样,每个部门就都能顺利地将其产品销售出去,各部门也就能因此而不断发展。

所谓储蓄供给的不可分割性,是指由于发展经济需要大量投资,因此,需要大量储蓄,而储蓄却不是随收入的增长而同比例地不断增长的,只有当收入的增长超过维持一定生活标准所需的消费水平以后,储蓄才会上升,大规模的投资才有可能。因此,每一阶段的经济规模必须大到足以保证收入的增长超过一定限度,否则,储蓄就无法大量增长。

与此相反,以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为代表的“不平衡增长”论者认为,“平衡增长”论实际上假定资源(尤其是资本)是无限供给的,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极为匮乏的,根本不可能同时在各部门或行业投入大量资源,因此发展中国家在

一定时期内应当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少数几个主导部门,然后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它部门的资源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稀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这里,关键是要选择好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由此赫希曼提出了著名的“联系效应”的概念。所谓“联系”就是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与其它部门之间的联系。一个部门与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称为“后向联系”,而一个部门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称为“前向联系”。那些具有最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的部门,应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

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将资源优先集中配置到“主导部门”,通过“主导部门”对其它部门的“联系效应”,“主导部门”对其“前向联系”的部门供给产品,并增加对其“后向联系”部门的产品需求,就能刺激其它部门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起飞,这将会比“平衡增长”战略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 资源配置的区域选择——“发展极”与“增长点”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一国各个地区的具体特点和条件不同,因此,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最有发展优势和增长潜力的某一区域或某一点上,即“发展极”和“增长点”,从而以此引导和推动整个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发展极”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尔鲁克斯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势头往往集中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这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行业一般聚集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是发展极。发展极对国民经济最积极的影响就是它作为生产中心和市场枢纽对广大周围地区发挥着扩散效应。

“发展极”理论又被英美经济学家改造为“增长点”理论。增长点理论虽然同发展极理论一样都高度重视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但与发展极理论强调“扩散效应”不同,增长点理论强调增长点中行业、厂商之间的亲和力(即行业之间、厂商之间紧密的网络关系)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这种效果使各行业或厂商能不断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可见,将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配置到发展极和增长点,就不比不讲重点,不加区别地在各地区分散

配置,更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增长。

(三)资源配置的方式选择——“静态比较利益”论与“动态比较利益”论

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采用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李加图的“比较利益”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要素(资源)比例和生产要素(资源)密集度原理。所谓生产要素比例,就是指一国所拥有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的构成状况,俄林认为,各个国家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这是由各国资源禀赋状况的不同所造成的。所谓生产要素密集度,是指特定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劳动、资本三者的比重,这是由产品生产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所造成的:生产不同的产品,必须投入不同组合的生产要素,如生产小麦需要很多土地,而需要的劳动和资本较少,生产布匹需要很多的劳动,而需要的土地和资本较少,生产机器需要很多的资本,而需要的劳动和土地很少。

俄林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谋求生产要素比例和生产要素密集度的一致,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发展本国相对丰裕的那一种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因为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相对丰裕,该生产要素的价格就较低,从而该产品的生产成本就较低。如果各国都生产并出口本国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那么各国就能通过国际贸易而各自获得比较利益,并使全世界的产出量达到最高水平。显然,根据俄林的这种比较利益论,发展中国家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较丰富的国家(发达国家)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样,发展中国家就能够获得比较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在静态条件下(即假定生产技术、资源禀赋和消费习惯固定不变),发展中国家根据俄林的这种比较利益论(即静态比较利益论)来确定资源配置的格局似乎是合理的。但从动态的眼光来看,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却极为不利。因为按照这种静态的比较利益论来配置资源,发展中国家就永远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是轻工业,这样,发展中国家就永远不能运用本国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重工业、尖

端工业),结果,发展中国家就永远只能处于落后状态而不能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针对这一重大缺陷,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生产率上升率基准”的概念。^①他认为,从长期的、动态的观点来看,由于各部门、各行业各自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势必导致各部门、各行业各自的生产率上升速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在价格结构一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速度快,即生产率上升率高的部门或行业,由于成本下降也快,就能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如果将资源优先配置到这样的行业,就能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是从“静态比较利益论”演化而来的,不过这种理论加进了时间因素,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对各部门、各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因此,“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实际上是静态比较利益论的动态化,这更符合资源配置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按照这种动态的比较利益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就应将资源大量配置在从某一时点看(静态地看)由于在发展初期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一时处于劣势地位,但从长期来看(动态地看),其技术进步速度较快因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上升率的部门或行业,这就会在未来的某个发展阶段因该部门或行业的成本不断下降、产出量不断增加而处于优势地位,而这对于迅速改变本国的落后状况是极有利的。

(四)资源配置的结构选择——需求决定论

任何社会之所以要将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便使这些资源得到最适度和最有效的利用,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判断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就看它是否符合人们的需求结构及变化状况,而人们的需求结构及变化是由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变动所决定的。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们对各种产品的产品的需求会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将需求变动对收入变动的这种关系称为需求的收入弹性(简称收入弹性),而不同产业的收入弹性是不同的,收入弹性高的产业、意味着其有广阔的市场,是社会急需发展的,因此,将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重点配置资源,就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切实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是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的“收入弹性基准”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并根据恩格尔定理加以推论,一

国在其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消费支出中的食物支出就会占很大比例，也就是说，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较大，因而这时一国的资源大部分应配置在农业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消费支出中的食物支出比例将不断减少，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不如对工业品的需求增长得快，也就是说，工业品较之农产品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人们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就在客观上要求大量资源（特别是劳动资源）逐步从农业转移出来而配置到工业部门中去，经济发展由此进入“工业化”阶段。由于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大量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去就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当经济进入较发达的阶段和人均收入达到较高的水平时，人们的需求结构又会发生变化。这时，人们就会要求社会能提供各种“服务”，以满足其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样，一个社会就必须将一部分资源配置到商业、服务业等行业，即第三产业上去，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

可见，资源的配置结构是由社会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只有完全与社会的需求结构相吻合的资源配置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因而才真正是合理的。

三、一点启示

我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一个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各种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启示或借鉴。如通过借鉴“平衡增长”理论，并根据我国的具体特点，我们就可研究如何将各种经济资源以恰当的比例合理配置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或各行业，以实现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基础设施与直接生产部门、原材料、能源及采掘工业与加工业等各行各业的平衡增长，从而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在长期内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再如，通过借鉴“不平衡增长”理论，并依据我国现状以研究如何将大量资源优先配置到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瓶颈部门”，以及具有较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能带动其它各种产业部门迅速发展的主导产业上，使国民经济能够有效地增长。又如，通过借鉴“发展极”和“增长点”理论，并结合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差异较大这一现实，我们就可研究如何合理地向各地区的中心城市重点配置资源，以加快其发展速度，从而充分利用各个发展极和增长点对其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以逐

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还如，通过借鉴静态比较利益论和动态比较利益论，并基于我国国情，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如何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一优势并抓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通过向国际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转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研究如何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向技术进步最快、生产率上升率最高的部门优先配置资源，以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特别是，运用比较利益论有助于我们解决我国目前各地区强调自给自足，而不是根据本地资源条件和比较优势以实现专业化大生产，致使各地重复建设，将大量稀缺资源用于生产很多同类产品，而不是将资源集中在发展少数几种商品的大规模低成本的生产并向外地出售这些商品，以通过交换来获得最大利益，且由于各地重复生产，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而实行地方保护、抵制外地产品、排斥竞争。由于缺乏全国性统一市场的竞争，结果导致各地出现很多生产同类产品的小规模工厂，致使资源充分利用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效率十分低。至于资源的配置结构应与人们的需求结构相适应，这在我国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造成我国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忽视“消费者主权”，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及变化难以指导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结果产品生产同需求结构不对路，出现某些产品因供过于求而积压浪费，另一些产品因求大于供而严重短缺的结构失衡现象，这就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促使资源的配置结构与人们的消费结构紧密吻合，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总之，通过适当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成果，并针对我国实际，进行更科学的理论研究，以便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起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注释：

①参阅杨治著《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周其仁等著《发展的主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 曾德国）